

“开天辟地”光辉历程的起点

——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纪事

20世纪20年代,上海法租界环龙路(今南昌路)和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之间,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;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,靠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,靠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,因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匆匆穿行,所以它被誉为“共产主义小道”。当年,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,犹如闪电划破黑暗夜空,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。

老渔阳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

1920年春,被毛泽东誉为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的陈独秀抵达上海,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(今南昌路100弄2号),他主编的《新青年》也随迁于此。

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住宅,被称为“柏公馆”,坐北朝南,砖木结构,两楼两底,红漆窗檐比较典雅,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纹饰。陈独秀入住后,楼上厢房为卧室,也有书房;楼下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椅,一块小黑板上写着“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”;旁边的厢房就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,参与编辑的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夜战。不久,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,到上海会见陈独秀,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。

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,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。1920年4月2日,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,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《劳动者底觉悟》的演讲,指出:“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”“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、最贵重”,并希望“做工的人快快觉悟”,第一步争取“改良待遇”,第二步“要求管理权”。4月18日,在陈独秀等支持下,上海中华工业协会、中华工界总会、电器工界联合会、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、中华工界志成会、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、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,筹备首次纪念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;会议决定在5月1日这天,除了电车、电灯、自来水、电话、电报等公共事业,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,工人群众列队游行以示纪念。4月29日,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《工界宣言》,其中申明:“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,因为五月一日,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作制幸福的日子。我们纪念它的意思,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;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。”5月1日,由于反动军警阻挠,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;下午3时,大会正式开始,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,挥舞红旗,高声歌唱;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,学

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。大会通过决议:一、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;二、组织真正的工会;三、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。然后,大会在“劳动万岁”的口号声中结束。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、大规模地纪念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。

1920年6月,陈独秀、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,决定建立党组织,并起草具有党纲、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,确定通过劳工专政、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;8月,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,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,定名“中国共产党”;11月,拟定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(也曾被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),由陈独秀担任书记,成员有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沈玄庐、杨明斋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李达、邵力子、沈雁冰、林伯渠、李启汉、袁振英、李中、沈泽民、董亦湘等。

1920年9月,陈独秀把《新青年》改版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,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,开辟“新论”“通信”“随感录”等栏目;年底,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,该刊由陈望道主编,沈雁冰、李达、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。

1921年6月,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,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;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,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,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。

1921年7月23日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(今兴业路76号)召开。会议期间,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,地方组织尚不健全,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,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共中央局,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。9月,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,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,常在此与中共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、宣传主任李达商量党的工作,并发出《中央局议决通告》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》等重要文件,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。

新渔阳里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重要基地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,对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,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(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)则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。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,两楼两底,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砖带饰,门额刻着“惟德是辅”四字,两侧有砖砌方壁柱悬垂。



新渔阳里6号旧影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,经维经斯基帮助,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色通讯社——中俄通讯社,设于新渔阳里6号,由杨明斋主持。中俄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发送通讯稿,报道中国革命消息;同时,向我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,稿源大部分取自共产国际资料和赤塔、海参崴、莫斯科等地的报刊,少量译自英国、美国、法国的进步报刊。

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,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诞生。发起人是俞秀松(担任书记)、施存统、陈望道、李汉俊、袁振英等8名青年,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。未一个月,团员就发展到30多名。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,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。1921年3月,上海已有团员约200人,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,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,由俞秀松担任书记,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。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培养革命干部,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,由杨明斋负责,俞秀松担任秘书。外国语学社的学员,少时为二三十人,多时达五六十人,其中有刘少奇、罗亦农、任弼时、任作民、萧劲光、李启汉、李

中、谢文锦、庄文恭、许之桢、梁柏台、曹靖华、韦素园、雷晋笙、陈为人、汪寿华、王一飞、彭述之、柯庆施、蒋光慈等。外国语学社使许多学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,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1920年10月3日,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,由在海军造船所(后为江南造船厂)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。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,陈独秀、杨明斋、李汉俊、李启汉等以“参观者”身份出席,并成为“名誉会员”。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《上海机器工会简章》,宗旨是“谋本会会员底利益,除本会会员底痛苦”。会后,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(后门牌为自忠路225号,原建筑已不存)设立了临时会所。

当年,新、老渔阳里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,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,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、第一个红色通讯社、第一份党刊、第一个青年团组织、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、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、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现于此。事实证明,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,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。 □朱少伟

语林指瑕

琼锅糖,一见超市所卖的这斯,我心中便顿感莫名。它到底是何方神圣,竟能如此分门别类,由条状到片状,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?是“神圣”。且看那包装袋上的介绍文字:

琼锅糖是源自陕西省富平县流曲镇的地方特产,具有800年历史,系采用流曲特有的优质井水与陕北产精选优质小米蒸饸,与大麦芽搅拌发酵淋汁,用铁锅熬成糊状“灶糖”,取出冷却,再在蒸气加热中反复拧条拉扯,使糖色由黄变白如琼。然后与炒熟的黑芝麻粉与其它辅料分层置于瓷缸内热烘,最后混压成饼,切成条或片,即成香味醇郁的风味食品“琼锅糖”。

及至买后品尝,这不就是我小时常食之“琼”锅糖么?香甜可口,却怎么介绍文字中只有易“琼”为“琼”,成了“琼锅糖”,连名字读音都变了?

我老家在陕西临潼渭北,与富平近邻,所以自小就知此物乃富平特产,尤以流曲镇所产者著名。那时候,寒冷时节,赶集或看戏,常见有卖此物的:以独轮车载以蒲筐(一种大型盛物之具,以竹篾编成)盛之,皆切成正方条状,条长数尺,码放齐整,卖者吆喝道:“流曲的烤糖(糖)!”买者便络绎不绝,那个烤糖啊,质地细密,香甜味美,一见便眼馋而口生津液,口渴而大快朵颐,买了吃了,便完成这天堂级的享受。由于种种原因,此物也久违多年。改革开放后,老树又著新花,烤糖又昂然而出,又成新宠,非但吸引人们的眼球,还是楼层上。2010年流曲所产的此物正式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。吾陕有此物,何其好也。

然而叫好之余,我又不得不,“琼锅糖”的“琼”是别字,当为“烤”。“烤”,《康熙字典》谓:“火干物也。”并引用《唐韵》《集韵》音训,云此字读音为qiǎo。与“琼”字读音相较,一为去声,一为上声,音虽相近,其实味不同。

此“烤”字,常在关中人口,读入声,如同“华县”“华山”“华阴”之“华”字,读入声而非读上声。以烤字而言,如烤红苕,便是在锅底只放少量水,用大碗而覆之,上置红苕,加火烤熟,味道更佳。又比喻,多人聚一房中,而房之门窗皆闭,不通风,不一会儿,便会有人喊:太烤了,开窗。

再回到“琼锅糖”的介绍文字中,“置于瓷缸内热烘”,热烘,不就是“烤”么?至于“琼”字,那显然是因不知“烤”字,而无奈作“琼”,所解的“琼”字,亦是生拉硬扯,拉郎配罢了。“琼”者,美玉也,又喻美好之事物,与颜色无关,“使糖色由黄变白如琼”,或强词夺理曰:琼者,玉也,色白如琼,便是色白如玉也。吾以为,此属曲解,以此物八百年的历史,以此物制作之特点,用“烤”字,作“烤锅糖”方妥。

这如同麦芽糖,白砂(蔗)糖的名称一样,烤锅糖,言此物用锅烤的制作方法而成,可那琼锅糖,无论何都是讲不通的。如若不信,请问流曲周边蒲(城)富(平)临(潼)渭(南)的父老,有谁能将“烤锅糖”读成“琼锅糖”的。在关中方言中,“烤”字读入声,“琼”字读上声,绝无混淆之可能,至于说什么“琼”是指色泽中的“白色”云云,更属无稽。

八百年的口音,八百年当用之字,八百年名动四方之佳品,不能因这十数百年便被浅学所误。但愿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的这富平特产,是“烤锅糖”而非“琼锅糖”。 □杨乾坤

钩沉

秦都雍城三百年间(前677年—前383年),国家大事在哪里议定?秦诸公对外扩张、称霸争雄的决策号令从哪里发出呢?今天,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先秦的行政中心——朝寝。

朝寝,顾名思义,“朝”原指朝廷,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:“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”,其专指国君举行朝典、接受朝见和处理政务的地方。“寝”指寝宫,如《周礼·天官·女御》:“女御掌叙于王之燕寝”,是指王公、后妃日常居住的寝宫及其相关的生活空间。

据介绍,先秦时期,曾有19位王公在雍城(现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)建都294年,虽然现在无地上建筑,但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地下文物遗存。雍城考古80年,文物工作者经过不懈探索和实践,基本掌握了秦雍城遗址的规模和布局。在面积达11平方公里的城址区范围内,堰塘、城墙、宫殿、聚落、陵寝、作坊等规整分布,气势雄伟,特别是瓦窑头宫殿遗址区、马家庄宫殿遗址区、高王寺宫殿遗址区等,规模宏大,内涵丰富,不但体现了秦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,也揭示了秦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和升华过程。如秦早期传承周制,为庙寝合一模式,后来发展为庙、寝分开且平行的模式,再演变成出现朝寝于国都中心,而将宗庙置于南郊的模式。瓦窑头宫殿遗址区就是庙寝合一模式的宫室建筑,为雍城早期建造和使用。而马家庄宫殿遗址区内,则是宗庙和朝寝分开,相距约500米。

1983年冬至1984年夏,考古工作者对凤翔区马家庄宫殿遗址区内的宗庙遗址(1981年发掘确认)以西500米处的先秦三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勘探调查。调查显示,该遗址南北长326.5米,北端宽86米,南端宽59.5米,面积约21849平方米。平面布局规整,四周有围墙。由南至北分为五座院落,五个门庭。第一院落长52米、宽59.5米,南墙和东墙有一门,门前有一段土墙,似为屏。第二院落长49.5米、宽59.5米至60.5米,南墙和西墙各有一门,院中部偏北两侧各有一长方形建筑。第三院落长82.5米、宽60.5米至62.5米,东西墙各有一门,南墙有一门。正中有面积约586平方米的长方形建筑一座。第四院落长51米、宽70米,东西南围墙各一门。第五院落长65米、宽86米,东墙中部有一门,院内正中偏北及其前方两侧,各有一座建筑呈品字形排列。院内南部有两座长方形建筑,其中一通道与第四院落相连,各院落的南门均大于其东门,应为主要门道。

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,推定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为秦国朝寝遗址。

著名考古学家韩伟先生在《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》一文中对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建筑群各部位名称进行了推定,认为马家庄三号遗址建筑群的五个院落为五重曲城,五个门庭即皋、库、雉、应、路五门,为天子宫殿的规格(皋门是宫殿的外门;库门是宫殿的传达室;雉门是外朝的大门;应门是朝臣办公的地方;路门是朝臣休息的地方)。可见,秦人已从宫殿建筑的规格上超越了君、臣礼制,表现出了秦人不甘落后,立志逐鹿中原,使子孙孙饮马黄河的宏图大略。

秦国在都雍的300年间,其政治能量、军事实力、经济水平以及手工业技术等均达到了高等水平,营造了规模宏大的“国际化”大都市及富丽堂皇的宫廷建筑。 □董海兵

「琼锅糖」?

秦都雍城三百年间国家大事在哪里议定

走过千秋说秋千

记忆中,老宅门口有一棵高大的洋槐树,一人伸开双臂还不能将其合围。儿时的清明节上完坟回来,年轻的叔叔腰上绑着并绳麻利地爬上树干,在洋槐树一根碗口粗横着的枝干上绑好并绳,将两根绳头垂到地面上。然后找来一块宽20公分、长50公分的木板,绑在两根绳头上,不一会儿,秋千就做成了。大人孩子们轮流荡秋千,年幼的我坐在秋千上,双手紧紧抓着并绳,叔叔用力推几下,秋千荡向空中。奶奶在下面紧叮咛:“我娃脚扎(方言,翘)起,手扳牢,跌到河里没人捞。”儿时荡秋千似乎是清明节最常见的习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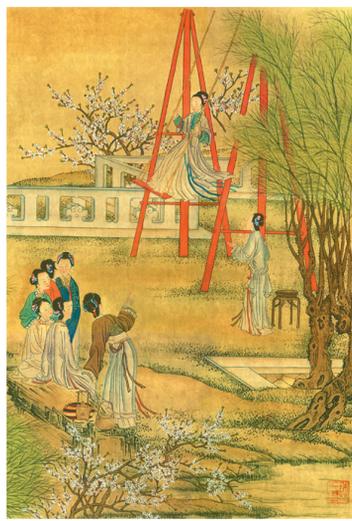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一种老少皆宜的玩具,秋千的历史可谓久远。荡秋千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。秋千,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。秋千最早叫千秋,后为了避忌讳,改为秋千。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为架,再栓上彩带做成。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。

秋千的起源,可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上古时代。那时,我们的先民为了谋生,需要上树采摘野果或猎取野兽。在攀缘和奔跑中,他们往往抓住粗壮的蔓生植物,依靠藤条的摇曳摆动,上树或跨越沟涧,这是秋千最原始的雏形。至于后来绳索悬挂于木架、下拴踏板的秋千,春秋时期在我国北方就有了。《艺文类聚》中就有“北方山戎,寒食日用秋千为戏”的记载。当时拴秋千的绳索为结实起见,通常多以兽皮制成,故秋千两字繁写均以“革”字为偏旁。

荡秋千是我国很多民族共有的游乐竞技项目。据现有文献记载,它源自先秦,《古今艺术图》上记载:“此(荡秋千)北方山戎之戏,以习轻(敏捷)者。”(见清翟灏《通俗编》卷三)山戎是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,属地在今天的北京市及其周围地区,秋千原是其进行军事训练的工具。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带兵打败山戎后,将其国土划归燕国,秋千也随之向南流传,后来逐渐演变成游戏的用具。

汉武帝时宫中盛行荡秋千,唐人高无际《汉武帝后庭秋千赋》云:“秋千者,千秋也。汉武帝千秋之寿,故后庭多秋千之乐。”荡秋千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。唐代宫廷把荡秋千称为“半仙戏”,五代王仁裕在其笔记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说:“天宝宫中,至寒食节,竟竖秋千,令宫娥辈戏笑以为宴乐。帝呼为半仙之戏,都中市民因而呼之。”

宋代出现了“水秋千”。据南宋宋自牧《梦粱录》等书的记载,不管是在北宋都城汴梁的金明池,还是在南宋都城临安西湖的钱塘江,都举行过这种杂技表演。每逢夏季举行水秋千表演时,上自皇帝妃子、王公大臣,下至庶民百姓,竞相观看。表演之前,先在水中置两艘雕画精美的大船,船头竖起高高的秋千架。表



往事

演时,船上鼓声大作,船尾上杂耍艺人先要练上竿,然后表演者按次序登上秋千,奋力悠来荡去。从秋千悠到和秋千架的横梁相平之时,他们双手脱绳,借秋千回荡之力跃入空中,在空中翻个跟头,然后投身入水。因表演者姿势各异,看上去惊险优美而又变化无穷。“水秋千”类似现代跳水运动,是宋代杂技的新发展,在中国杂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对后世颇有影响。

唐宋以后,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,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,荡秋千才演变成节日中广场的狂欢节目。杜甫有诗云:“十年蹴鞠将雏远,万里秋千习俗同。”刘禹锡亦有:“秋千争次第,牵拽彩绳斜。”可见荡秋千习俗流传之广之盛。清代,郑板桥任知潍县(今山东潍坊市)县令,曾赋诗一首,描写春天三月民间“荡秋千”“放风筝”等欢乐场面:“纸花如雪满天飞,娇女秋千打四围。五色罗裙风摆荡,好将蝴蝶斗春归。”

现在,秋千遍布公园、健身广场、学校等场所,不但是大众喜爱的娱乐项目,还是专业体育项目。荡秋千不必等到清明节,只要有时间,随时可以在家门口的健身广场过一把秋千瘾。 □雷焕

陕西瑰宝

五代天青釉「官」字款剔刻花执壶



年代:五代

收藏单位:陕西华夏古代艺术博物馆

这件五代天青釉“官”字款剔刻花执壶,釉色天青,釉水一流,剔刻工艺深刻流畅,高浮雕效果明显,其壶的盖上有花、颈肩花、口流花、壶身牡丹花、下刻仰莲纹,再配以温碗更为难得。尤其珍贵的是壶底刻疑似“官”字款,后经中国瓷器大家和耀州窑专家鉴定为“官”字款。其证明作用极其珍贵,为目前所见五代白胎天青釉瓷器中的孤品。 □岳琳瑜